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主编



[1914.8—1914.11]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感受到一点崇高的
意味。从此刻起，
我们开始感受到卑贱
的时光已经到来。「耶
和和使人贫穷，也使
人富足，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

卫礼贤博士一战青岛亲历记

◎（德）卫礼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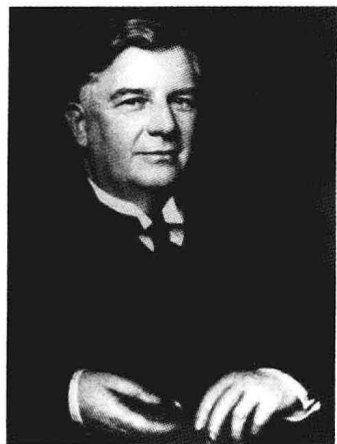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14.8—1914.11]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感受到一点崇高的
意味。从此刻起，
我们开始感受到卑贱
的时光已经到来。耶
和和使人贫穷，也使
人富足，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

卫礼贤博士一战青岛亲历记

◎ (德) 卫礼贤 著

◎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德)卫礼贤著;秦俊峰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5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334-5865-2

I. ①德… II. ①卫… ②秦… III. ①日记—作品集—
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122 号

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
(德)卫礼贤 著
秦俊峰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4258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102600)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8.25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865-2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0591-83752790)联系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总序

叶隽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较快推

进，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文化因其所处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中德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

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投入到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古代中国”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

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地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画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

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19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的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德文版序言

威廉^①博士——泛新教传教协会^②青岛分会的负责人——从 1899 年以来一直待在青岛。他深谙中国的人文地理，曾经将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译成德文，在中国各个阶层当中均享有很高的声望，与中国上层人物保持着亲密关系，许多年前就已经光荣地被中国政府授予四品官衔。在青岛被围攻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留在青岛，不畏强暴、细心周到地履行了自己的职权。他在医院里得到了勇敢并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护士玛格丽特·维特威的大力支持。即便是在德国租借地被日本人占领以后，他仍然坚守岗位。青岛被占领后不久，他在家里遭到了一伙中国流氓的袭击，他被绑住了手脚，家里也被洗劫一空，多亏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才保住自己的性命。后来他在给家里的一封信里只是抱怨这些强盗夺走了他宝贵的两个小时工作时间。在这期间他重新启动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以便让大约 50 名中国人可以像往常一样上学；此外他还小规模地恢复了女子学校的开学。日本政府在这方面为他提供了友好的支持和协助。最近他

① 卫礼贤的德文姓氏。

② 即基督教同善会 (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1884 年成立于德国东部城市魏玛，系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和大学教授发起创办的基督教新教传教会。主张首先在东亚的文明古国中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并冀望于通过殖民扩张推动基督教和德国文化的传播。成立次年即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花之安，后由卫礼贤继任。1929 年更名为东亚传教会 (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还接受了新教神甫一职，热心地为留下来的德国人提供宗教服务。

威廉博士在青岛被围攻期间写下了一本日记。由于通信困难，我直到现在才通过他在上海的夫人得到了日记的副本。威廉所作的这本日记原本不打算公开发表，但我却认为不应当私自把这本日记扣留下来，因为有更多的人希望能够读到这本日记。于是我就对日记做了些无足轻重的修改，并删去了一些完全属于私人范畴的内容。因为是以日记的体裁发表，所以对围攻青岛的描写并不拘泥于行文的流畅，上下关联也不紧凑，而只是将个人内心的感受、观察和经历无拘无束地告诉读者。但正是这种自然的形式给整本日记的内容增添了特别的魅力；而威廉在日记里插入的对个人体会的不同描绘更是营造了独特的氛围。青岛被围攻的那些日子，对于在那里战斗和居住的人们来说，是一段严肃和充满恐怖的岁月，但同时也是值得钦佩、经受了考验的岁月。威廉博士的这本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对那段悲伤而又伟大的岁月的珍贵回忆。

奥古斯特·林德

前 言

一、生平简介

卫礼贤博士 (Dr. Richard Wilhelm, 理查德·威廉博士, 中文名卫希圣, 字礼贤, 习惯被称为卫礼贤, 1873—1930), 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当时的符腾堡王国的首都——斯图加特市, 父亲是一名玻璃画匠, 但在他很小时就因病去世, 由母亲和外祖母担负了他的早期教育。

1891年, 卫礼贤在图宾根大学修读神学。期间, 对哲学、文学和艺术表现出强烈兴趣和热爱, 以莎士比亚、斯宾诺莎、贝多芬、歌德为代表的欧洲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他影响甚深, 尤其喜爱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并因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缘”的基础。

1895年8月, 卫礼贤通过了神学职业资格考试, 并于同年底被派往斯图加特的一家修道院附属教堂担任神职工作, 后升至代理牧师。1897年1月, 卫礼贤被派往临近城市接替患病的牧师特奥菲尔·布鲁姆哈特 (Theophil Blumhardt), 并结识了布鲁姆哈特的侄女、未来的妻子美懿^①。

^① 美懿 (Salom Blumhardt, 1879—1958), 德国传教士克里斯朵夫·布鲁姆哈特 (Christoph Blumhardt) 之女, 1900年与卫礼贤在上海举办婚礼。婚后育有4个子女。卫礼贤去世后, 撰写传记《卫礼贤: 中国和欧洲的精神传播者》(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1899年5月，受基督教同善会^①的差遣，卫礼贤辗转经上海来到刚刚被德国强占的青岛租借地，以接替拒绝接受同善会传教理念的卡兰茨^②，协助该会另一名传教士花之安^③布道。

甫到中国，五千年的璀璨文明深深吸引了卫礼贤。在他看来，“在一个已经具有自己文明的国家”，不应当向当地民众强迫灌输宗教思想，而应当让他们自主作出抉择。因此，在中国的25年时间里，卫礼贤没有给一个中国人施行洗礼。^④不仅如此，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传教身份，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自觉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服膺者和传播者。

卫礼贤在抵达青岛后的当年即提议创建一所师范学堂培养师资，并得到德胶澳总督府的允准。1900年5月，卫礼贤与新婚妻子美懿在青岛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初

① 基督教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又称作泛新教传教会，由德国和瑞士两国的基督教于1884年联合成立于德国城市魏玛的基督教新教传教机构。主张首先在东亚的文明古国中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并冀望于通过殖民扩张推动基督教和德意志文化的传播。成立次年即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花之安，后由卫礼贤继任。1929年更名为东亚传教会（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② 卡兰茨（Paul Kranz，1866—1920），同善会传教士，继花之安之后于1892年被派往中国传教，服务于上海教区。1898年花之安病重后，曾代理过青岛教区数月。后因传教理念和认知不同，于1902年退出同善会，但仍停留上海私人传教至1910年。

③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德国传教士，有“19世纪最渊博的汉学家”之称。出生于德国科堡，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又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尤其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中国，抵香港后，即转赴广东内地办学及办诊所，注重中西文化交流，1873年写出介绍西方学校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论教育的《教化论》。1880年脱离礼贤会独立在香港工作。1885年加入同善会，并来上海开辟同善会的传教工作。除执行教牧任务外，主要从事文字工作，1887年他同另一传教士去四川，研究峨眉山一带的植物。考察中发现的许多植物新种属，后人多以他姓氏命名。1888年一度参加广学会的工作。1893年在中华教育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的演说，强调传教工作必须运用儒家思想，主张在教会学校中，以英语代替汉语授课。1893年他还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宣读关于儒学的论文。1898年德国强占青岛后，即移居青岛。德国占领军特设一医院取名福柏（Faber）医院以纪念他。其著作还有《自西徂东》、《玩索圣史》、《性海渊源》、《经学不厌精》、《儒学汇集》、《中国宗教学导论》、《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哲学家孟子的学说》、《从历史看中国》、《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国著名男子》、《中国著名女子》等十余种。

④ 参见卫礼贤著/王宇洁等译：《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页。

期规模不大，学生不及十名。后得到同善会资助，于次年建起独立校舍，正式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 Schule），1903年迁入教会山^①。该校实行“中西结合”的教育方针，学程7年，前3年是小学，后4年为中学。至1906年，礼贤书院已经扩大至4个班，60余人。该校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早期中学之一，开风气之先，前后毕业学生达千余名。因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朝廷赏赐卫礼贤四品顶戴，以嘉奖其办学之功。

1904年，卫礼贤建议中德政府联合创办青岛特别高等学堂，1909年建成。1905年，受同善会委托创办女子学校，以其妻之名命名为美懿书院，后与文德女子中学合并。

直至1907年，卫礼贤才第一次与他的妻儿回国度假，但次年又回到中国。

为了研究学术，卫礼贤又于1913年在礼贤书院内创办了尊孔文社，这是一个自由的学术团体，主要由两类人群组成：一是以清末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为代表的晚清遗老，二是在青岛从教的德国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展东西方对话，故又被称作“中西文社”。不久又建成藏书楼，典汇中西书刊3万余册，以中国传统文化经籍为主，供学者查阅，成为青岛首家公共图书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卫礼贤与家人长期分离，坚持留在青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因为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所以不仅没有成为日本的战俘，反而承担起牧师的职责，照看留下来的200余名德国人和中国难民。在此期间，不定期地出版杂志《给朋友们的报告书》并在欧洲发行，及时报道有关青岛和中国的最新消息。

1920年，卫礼贤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传教生涯，回到了德国，在各地演讲和传播中国文化。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于次年初再次来到中国并有机会结识“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代表如蔡元培、胡适等。1923年，因经济危机，卫礼贤被德国驻华公使馆解职，

① 今青岛市第九中学。

后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

1924年，卫礼贤回到德国，永远告别了中国。他被法兰克福大学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名誉教授和终身教授，并在当地创办了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专以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联络中德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同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

1930年，卫礼贤在德国图宾根去世，终年57岁。

二、对中国的情感

与坚持捍卫殖民利益的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卫礼贤从始至众对中国的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对包括他的同胞在内的西方列强表现出的殖民者的高傲十分反感。他认为中国的苦力“不只是苦力，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乐和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忍耐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生活，谁以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冷淡、僵硬、逃避的态度对待谁”。^①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卫礼贤敢于直抒己见，以较为公允的立场分析事实。他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欧洲人深信，一定要保护优越的欧洲文化不受黄祸的侵袭，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正是他们自己在采取攻势，在彻底败坏远东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②，并对八国联军的在华暴行予以严厉谴责：“如果说，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它落后于时代的象征，那么，得胜的各国联军似乎是为了显示所谓‘文明国家’的粗鲁和残忍而来的，而且这种粗鲁和残忍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谴责的中国人差。”^③他尤其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中国）国内到处都有外国人，他们用武力和不平等手段四处渗透。……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

①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0—11页。

②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1页。

③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6页。

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行夺走的？难道这些欧洲列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强盗行径的翻版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① 并积极为调解殖民者与中国民众的争端四处奔波：“相信这一定起因于相互间的误解，”“尽管有许多朋友为我担忧，并竭力劝阻，我还是决定到那些地方去，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② 卫礼贤的努力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感谢。“我收到了许多丝绸刺绣装饰品，他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后来在一位省级长官的提议下，中国政府的一位代表还授予我一枚纽扣状的东西，它象征清朝官僚体制中的某个级别。”^③

此外，卫礼贤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国教会在华传教方式的弊端：“如果说原来基督徒们受过迫害的话，现在他们努力去进行反击。事实上，许多人就是怀着其他目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想通过教会来支持自己的法律行动。比如，他恰巧与邻居有隙，又心想报复，那么入教确实对他有利。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指控他的邻居是（义和）团民，他得到的好处恐怕比他期望的还要多。”^④

三、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

卫礼贤对中德文化交流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他先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涉及到儒、道等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经籍译成德语。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且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产生的，花费了卫礼贤十余年的心血。他的德文版

①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4页。

②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7—18页。

③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8—19页。

④ 卫礼贤：《中国心灵》，第19页。

《易经》1924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至今已再版20多次，还被翻译成英、西、法、意等多种语言，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荣格曾专为英译本作序。上世纪70年代，《易经》英译本甚至成为美国嬉皮士运动的神书。

卫礼贤的译本受到了德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也遭到了一些专业汉学家的非议。他们认为，卫的翻译有时过于迁就西方读者而曲解了中文原意，并且有些翻译缺乏进行进一步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德国著名汉学家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年）甚至指出了卫礼贤译文中的语言缺陷。

卫礼贤一生译作和著作颇丰，代表作有：

1905年，《大学》

1911年，《道德经：一位老人的生活和感知/老子》

1914年，《中国民间故事集》

1916年，《孟子》

1922年，《中国的人生箴言》

1924年，《中国的文艺复兴》

1924年，《易经》

1925年，《中国心灵》

1927年，《中国文学史》

1927年，《歌德与中国文化》

1928年，《中国文化的历史》

1929年，《中国哲学》

四、关于《中国日志》

从《中国心灵》一书，我们可以得知，卫礼贤有记日记的习惯。^①这对于研究卫礼贤和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本书（以下简称为《中国日志》）外，卫礼贤的其他日记从未在德

^① 参见卫礼贤：《中国心灵》，第九章：云冈石窟——我的日记片段。

国公开发表，更谈不上中文译本。^①因此，这本写于青岛日德战争期间所作的日记尤显珍贵。

《中国日志》的德文原著名为：《1914年世界大战中在青岛的艰难岁月》，写作时间跨度为1914年7月底至11月9日，基本涵盖了日德战争的全过程。卫礼贤不仅对德国备战和战事进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同时也用很大笔墨聚焦于战乱年代中国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史料性较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卫礼贤基本上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这场战争，语气客观、平和。尽管有时也能见到一些爱国主义的表述，如“我们的英雄抵抗了敌人的优势兵力”，但在绝大多数篇幅中，他都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带有情感色彩的“我们”，而更多地使用了中性的“德国”，如“德国飞行员”、“德国士兵”、“德国炮兵”等，其中仅“德国人”全文即出现了9次之多。甚至对于敌对的日本，卫礼贤在日记中也不乏肯定或为其辩解的言辞，如“在攻占青岛期间，类似的劫掠屡见不鲜。原因在于日本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城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令人有些措手不及，而日本军官们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的士兵们有所约束。但除此以外，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方面是希望维持良好秩序的。”或许正是因为卫礼贤的“国际主义”，《中国日志》于1914年底在德国首版发行数千册后因受众寥寥未能再版，而同期另一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的同样题材的报告文学《青岛飞行员历险记》^②却广受好评，至20世纪30年代末再版数十次，销量超过60余万册，并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语种。

尽管卫礼贤的《中国日志》未能成为畅销书，但却因此而保留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今天读来，文学性和历史性仍兼而有之。在日记里，卫礼贤对战争的惨烈局面没有太多直接的描述，但通过一幅幅生动、细致的画面，如被地

^① 从本书德文原著的前言以及卫礼贤夫人美懿的传记《卫礼贤：中国和欧洲的精神传播者》中可以了解到，卫礼贤的家人曾经保存了卫礼贤绝大多数的日记和手稿。但随着年代的流逝，日记是否存留完好，不得而知。至少，迄今为止，除《中国日志》外，未曾见有卫礼贤的日记以任何形式发表。

^② 《青岛飞行员历险记》(Die Abenteuer des Fliegers von Tsingtau)，作者为德军驻青岛飞行员贡特·普吕肖夫少尉(Gunther Plüschow, 1886—1931)。